



刘童
敦桢



梁杨
思廷
成宝

杨永生 明连生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6.1886

Y326



刘敦桢、童雋、梁思成、杨廷宝

杨永生 明连生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Z0035434

K826.16

(京)新登字 035 号

图书在版书目 (CIP) 数据

建筑四杰: 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 / 杨永生,
明连生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ISBN 7-112-03592-9

I. 建… II. ①杨…②明… III. 建筑学家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411 号

版式设计: 蔡宏生

建筑四杰

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

杨永生 明连生 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制作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6 1/2 字数: 172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100 册 定价: 14.00 元

ISBN 7-112-03592-9

TU·2777 (884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1999. 6. 25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6384051

访印日记

1月8日

晨五时起床。六时一刻到机场。对外文委林司长、庭萱副会、汪季琦同来机场。付礼喜及所带之便服、手帕等来送。七时一刻起程。过山西南部。见残雪。十时半抵西安。休息一小时。继续渡南来。抵李庄时。飞机高度约4000呎。下午一时半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午餐。因气候难当天往白市驿。

致电对外文委南昆明郭明生报告行程。

1月9日

上午九时起床。十一时半到昆明郭明生来机场迎接。快。寄存衣服后。下午一时起床。六时二刻到仰光。驻印大使馆董二同来来接。印度大使馆亦派人到机场迎接。当夜住大使馆商务处。访李一视大使。谈一小时。

仰光颇热。又对宴平池灯。

1月10日

上午休息。下午一时出城。九时起床。由二时半。机加全各章。章从半市空山拉有官信处来接。住Grant Eastern Hotel。九时访陆曦。谈至十一时。

当地气候比仰光稍凉。为南亚九月即情况。

目 录



创业者的脚印

——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

刘叙杰 7



淳朴而杰出的童高

杨永生 31



开拓者的足迹

——梁思成的一生

林 洙 51



广厦魂

——记建筑学家杨廷宝

刘向东 吴友松 81



刘敦桢
(1897 ~ 1968)



1919年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留学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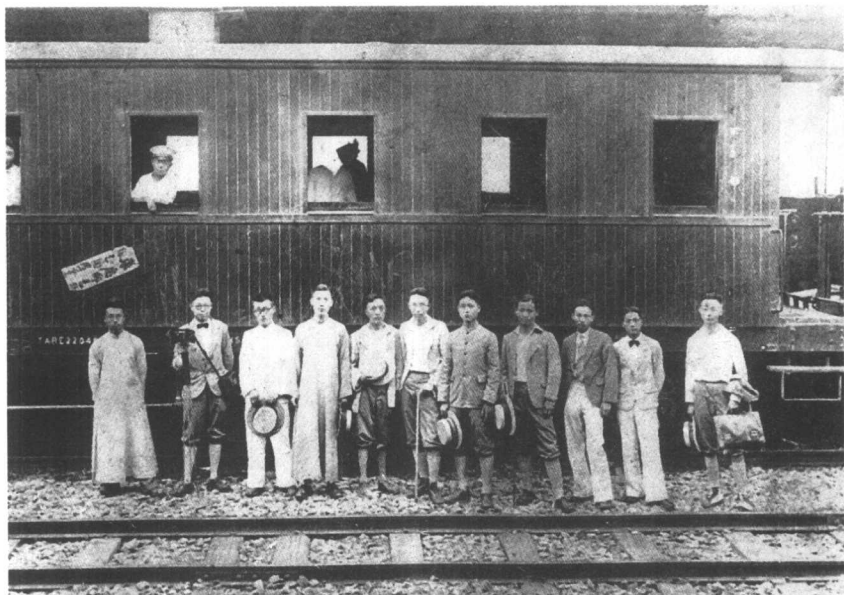
湖南新宁刘敦桢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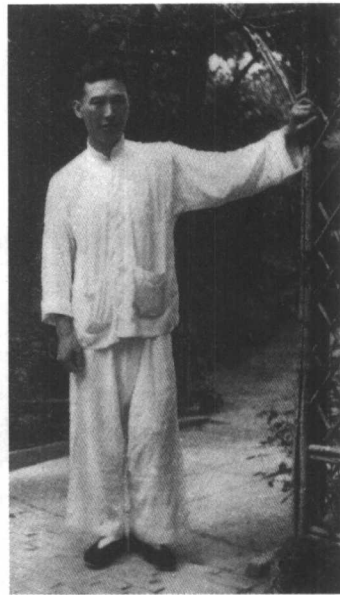
1920年摄于日本某地海滨



1930年与中央大学教师及学生合影



1930年率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北上参观测绘古建筑，摄于浦口车站



1935年摄于苏州



1930年北上参观测绘古建筑，摄于胶济路货车上
1933年秋对河北定兴义慈惠石柱（北齐）调查时留影



1935 年摄于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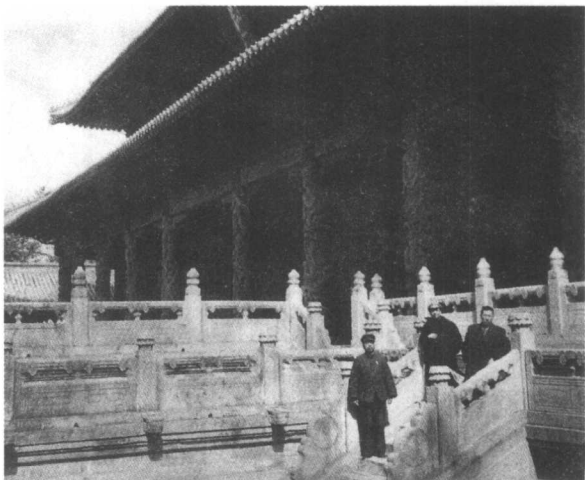
1947 年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工程技术组成员合影



中央大学建筑系教师与 1949 届毕业生合影



1950 年春与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成员调查六朝文物时合影



1950 年 4 月对曲阜孔庙调查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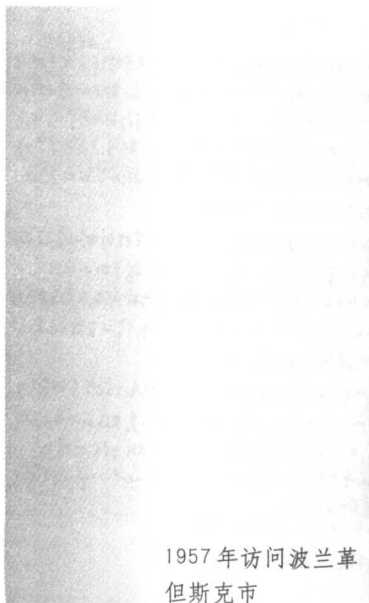
刘敦桢 60 岁生日时与夫人陈敬合影



1956 年于苏州钮家巷方宅丰亭



1956 年与梁思成等访问波兰



1957 年访问波兰革
但斯克市



创业者的脚印

——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

刘叙杰

编者按：刘敦桢（1897年9月～1968年4月）我国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建筑教育事业和古代建筑研究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培养了一大批建筑人才，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基础。

1987年南京工学院纪念刘敦桢先生诞辰90周年时，《建设报》特约刘先生的爱子、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刘叙杰撰写了《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于1987年11月3日～12月22日在该报“长城”副刊上连载。此次汇编成书，作者又作了文字上的修订。

1897年9月19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父亲诞生于湖南新宁东门外曹家码头后街的老家中。这个靠近广西边界的偏僻小县，青山环抱，绿水萦回，刘氏宗族是当地著名的大姓之一。依族谱所载，它的始祖在明末天下大乱时由江西迁来，在这里披荆斩棘，创家立业。200余年间，逐渐发展成为宗脉繁茂、人户众多的望族。特别是经过清末那次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族人先后投效湘军并取得功名顶戴的，为数相当不少。其中还出现了像封疆大吏刘坤一、刘长祐那样著名的人物。这样，就使得刘姓在县中形成了宅祠相望、邑人刮目的特殊地位。但是，父亲所属的这一房，在整个家族中只算得是旁支弱系，其政治、经济势力既不显赫，丁口也不很兴旺。我的曾祖父曾官至知府，中年不幸在四川任上去世。祖父当时年幼，后来虽靠苦读中试，然而已经是清王朝的强弩之末，只做了一任江苏东台知县就挂冠回家了。祖母李氏出身于县内另一大族，是一位典型的三从四德封建女性，生有三个儿子，父亲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湖南省历来对外比较闭塞，特别是湘西、湘南一带的山区州县，封建保守的气息较之他处更为浓厚。由于我家历代都是科举官宦出身，所以对子弟也赋以同样期望。为

此，父亲从四岁起就随着两位兄长受教于家馆，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一直读到四书五经。由于他专心用功，虽然大多靠囫圇吞枣式的强记硬背，但他因此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文史知识，并培养了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这些对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与学术成就都有很大的帮助。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之战，帝国主义恣意侵略与奴役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而满清政府从开始时的无端狂妄自大，一变而为后来对列强的卑躬屈膝，签订了许多辱国丧权与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国内民情为此激昂愤慨，纷纷要求对腐败落后的现状进行变革。然而，李鸿章、张之洞等朝廷大员推行的“洋务运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物提倡的“立宪变法”都遭到失败。这就使孙中山先生等有志之士认识到：必须进行彻底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出路。父亲的大哥是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积极地参与了革命前的秘密工作。1909年，为了使两个弟弟也能摆脱旧环境的束缚和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带领他们来到长沙进学堂读书。从一个十分闭塞的山区进入这省内最开放的首府，对父亲来说是大开眼界，也是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一直到后来很久，父亲还多次提起了这件事，并由衷地感谢他那早逝的长兄。

父亲在长沙先后进入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楚怡小学和楚怡工业学校，学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与社会思想，并和大家在1911年10月共同迎来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但是后来他没有像大伯父那样到各地继续奔走，唤起民众，也未和二伯父一道去保定军校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最适合于自己的科学救国道路。1913年9月，他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东渡扶桑，从此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学习与生活。先后前往的，还有日后成为知己的柳士英先生。

初到异国他乡，由于语言文字与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适应，曾给他这16岁的少年以许多困难和烦恼。但是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使他很快就克服了重重障碍，

名列前茅。加以参加了长跑和游泳等多项体育运动,使他原来像“豆芽”那样纤弱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长期一直折磨着他的胃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16年4月,父亲考取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机械科(即机械系),这是一所直到现在仍然十分著名的日本高等学府(现改名为东京工业大学)。由于发现学建筑对自己更有吸引力,父亲于第二年转到了建筑科。而这个转变,对他的一生是具有极大影响的。在大学的几年间,父亲不但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都保持着优良成绩,同时也是游泳、田径和足球场上的健将。这个巨大的变化,不但使他的中国旧友,也使他的日本同学感到惊讶和佩服。可惜的是,那些表彰他学习和运动成绩的奖状奖章,以及学生时代的留影,在多年的动乱中已荡然无存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整个灿烂东方文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许多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特点,但其若干内容则渊源于有更久远历史的古代中国,其古代建筑自然也不例外。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很注意保护古迹,所以至今还有不少早期建筑保存完好。父亲在课程学习和旅行参观中有机会看到这些,很为它们的宏丽外观与巧妙结构而赞叹不已。联想到更为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当时只有日本和德、法诸国的少数学者,如伊东忠太、波希曼、伯希和等作过一些考察和研究,而国内学界于此反而寂寞无闻。这种反常的现象使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深感惭愧与痛苦,但也促使他树立了日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志向与决心。

1921年3月父亲获得了东京高工的毕业证书,随即到老师池田先生所在的建筑士事务所,进行了9个月的见习工作。这一阶段的实际锻炼,给他增添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对日后的独立工作帮助很大。次年春天,在谢绝了池田老师提出的长期居留日本并继续工作的建议之后,就买舟返回上海,结束了长达9年的旅日生活。归国后,先受聘于上海绢丝纺织公司任建筑工程师,承担了该公司所属的若干工业厂房的建筑设计任务。不久,又参加了创建第

一所全由国人主持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的工作。

1925年6月,父亲回到长沙,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设计了校内的教学大楼,以及城内的古建筑天心阁和一些机关的办公建筑。约莫在这年的秋天,经堂叔刘弘度先生(后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中国古典文学教授)介绍,认识了当时在湖南大学就学的陈敬女士,也就是我的母亲,随即于次年订立了婚约。母亲的家庭也是省城中著名的望族之一,外曾祖父是位精明干练的企业家,曾于清末弃官从商,先开过矿,修过铁路,后来以创办长沙电灯公司成功而成为名噪省内的头等实业人物。他除了在生产中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工业技术以外,在自己的生活中加入了许多西方内容,又延请了外国教师教习子弟,并把长子(我的外祖父)送往美国留学。这在民国初年保守思想还占有很大势力的长沙,的确是件很不简单的事。因此,我的外祖父就成为清华学堂第一批赴美学习的留学生,在宾州大学专攻经济学,先后在国外考察与生活了十余年,返国后在湖南大学执教。他一共有子女9人,母亲居长,最小的舅舅比我还小一点。

父亲回忆起当时到外祖父家初次赴宴的情景是很有趣的。那是一座位于长沙教育坪附近的大宅邸,从大门到宴客的厅堂要走过好几重庭院。那天赴宴的除了母亲的直系亲属外,还来了许多堂、表的伯、叔、姑、姨、舅以及他(她)们的配偶和子女,足足有100多人。大家把未来的大姑爷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为了仔细看一看这位娇客的模样,挤不进来的就站在凳子上瞭望,而且七嘴八舌的问候和祝贺(当然也少不了私下的评头论足),使初次到来的客人穷于应付与无所适从。这个事先未曾料到的“人海战术”如此声势浩大,给父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他在许多年后向我们子女讲述这段经历时,还感到有些“心有余悸”哩!

1926年秋,父亲来到苏州,应聘于苏州工业学校建筑科执教。这学校是他的老友与留日同学柳士英先生偕同朱

士圭、黄祖森先生等于1923年创办的,是我国建筑教育中的第一个专科性质的学校,培养了许多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骨干。

次年年底,苏州工专建筑科奉命迁往南京,并入江苏大学工学院,旋改第四中山大学,最后定称为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正式设置建筑专业的开始。这一专业的设立,不但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而且还对当时社会的生产发展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帝国主义仍然在许多方面控制着中国的要害与命脉。例如那时的一些主要新型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全部为外国洋行所垄断。其中除了有政治上的因素以外,国人未能掌握先进的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后来有一些自日、美、英、德等国攻读建筑学归来的留学生,但数量上仍然远远不敷建设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发展,也要求在各门科技中有中国人自己的队伍。因此像苏州工专那样的技术学校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求,而培养更多的和更高级的建筑人才,就成为社会赋予中国新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那时去南京的除苏州工专建筑科的全体学生外,还有少数应聘教师,父亲即其中之一。参与创建与筹划这一新系事务的,除父亲和首任系主任刘福泰先生外,还有卢树森、李毅士、贝季眉诸先生。他们都先后留学美、法、德等国,因此对建筑系在我国应有之学制、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等,均有许多不同意见。经过反复对比国内外情况和讨论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与实际可能后,将建筑系定为:学制四年,实施学年与学分制;培养目标以建筑设计为主,但需具有必要的各项工程与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良好的对建筑美学上的欣赏与表现能力;着重培养学生正确与全面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除必修课程外,另增若干选修课等原则。

由于这时建筑系刚刚成立,其教学制度与教学内容均在试行阶段,系中师资与图书设备都很缺乏。为了弥补这

些不足,除了由学校努力招聘人才、增添书刊与教具外,还鼓励教师在教好本门课程时,尽可能多兼授其他科目。这个额外的要求使育人者倍加辛苦并增加了实施的难度,许多教师认为难以接受。而父亲为了教学上的需要,曾先后担任过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法、西方建设史、建筑营造法、阴影透视、建筑测量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等课程。通过这些实践,不但解决了当时系中师资缺乏的燃眉之急,对授课教师同样也是一次很好的深入学习与全面提高。教师在了解多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后,就有可能全面协调各门课程的分量与比重,以及其间的内在相互联系,并可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予以综合解决。父亲对这样的教学甚为赞同。无论对当时的教学实践或多年后担任系主任、院长的行政工作,这都使他得益匪浅。

此外,他对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很重视。除了在日常教学中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父亲还亲自带领学生到各地实习参观。如1930年就曾率助教濮济材、32级与33级的学生率其一(后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已故)、杨大金、戴志昂(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已故)、张镛森(后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已故)等北上,到山东曲阜孔庙和故都北平的宫殿、庙宇及其附近的颐和园、香山、明十三陵、居庸关等处参观古迹,并作了测绘和摄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这也是国内对自己的传统古建筑所进行的一次最早的科学考察活动。

中大建筑系开始招生不多,有的班级只有两名学生,最多的亦不超过10人(已招若干女生)。这是因为建筑系中的某些课程(如建筑设计、素描等)只能用个别辅导而不能靠上大课的方式。因此,在教师严重缺员的情况下,学生的招收人数也必然受到限制。虽然早期系内毕业的学生不多,但他(她)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则不容低估,有的至今还在祖国各地担任着建设中的重任,成为生产、教学、科研等工作里的中流砥柱。例如许道谦(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张缚(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曾子泉(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唐璞(重庆

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系主任)、林宣(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张开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王惠英(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建筑系教授)、孙增蕃(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何立蒸(西南军区营房部高级工程师)等。

除了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建筑师事务所中的设计工程以外,父亲的业余时间大多用于阅读历史文献与踏访古建筑遗址。但在周末却又常常搭乘京沪铁路的夜车赶到上海,第二天踢一场足球或观看比赛,晚上再乘车返回南京。一个单身汉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据杨廷宝伯父的回忆:“我第一次拜访士能(父亲号)兄是在1929年,那时他住在中大附近的大石桥,独自租了一间房屋。我去时他正伏在桌上绘图,桌上、床上和地上都堆了不少书籍,还有一些收集来的唐砖汉瓦以及穿着的衣物零散地放着。我们就在这不太整齐的小屋里畅谈了一个下午,相互感到很默契,从此开始了数十年不渝的深厚友谊。”这番话是1980年间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言犹在耳,可是杨老离开我们快五年了。联想到父亲生前的知交旧友,如梁思成、林徽因、童寯、赵深、哈雄文、吴有训、童第周、贺昌群、曾昭璜、柳士英等先辈,以及海外的李济、董作宾诸先生,至今都已不在人世,而他(她)们的音容谈笑依旧萦系眼前,仿佛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思之不禁惘然。

父亲是在1930年结束了他的独身生活的。那年冬天他来到长沙结婚。由于曾外祖父的思想开明,婚礼的地点安排在青年会而不是在家里,新人对长辈也只好鞠躬礼而不叩头,这些“超越常规”的做法在当时大部守旧的亲友中自然会引来某些非议。根据日后保存的照片来看,新人的礼服也是中西合璧的,母亲着西式衣裙披长纱,而父亲则穿戴上传统的长袍马褂。结婚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和前一天的狂风暴雨截然不同。有人开玩笑说是新姑爷打点了气象台的关节,才预订了这样的好天气。

婚后不久,父母亲就一同回到南京,在鼓楼附近的唱经楼后街租赁了一个小院,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

活。一年以后,我就在这里呱呱坠地了。

父亲在1922年归国后,就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先是广泛查阅中外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利用假日陆续考察沪、宁、杭一带的古建筑和遗址。后来在各方面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写作论文。192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首篇著作《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1931年又写出了对两篇日本译文《法隆寺与汉、六朝式样之关系》与《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的补注。此外,还在南京中山陵前设计了一座全由石构的光化亭,作为对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研究的又一次实践。这些工作,都引起了远在北平的朱启铃先生的注意。这位在北洋政府中曾经屡居要职的耆老,一直热心于研究与整理华夏建筑的国故,并于1929年在故都北平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学社)。他除了不断向各界宣传呼吁并努力筹募研究经费外,还积极邀请社会知名人士与中外有关学者参加。梁思成、林徽因、陈植等先辈和父亲都是在那时先后加入了这个由私人发起和组织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国内唯一学术团体。

由于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极有限,要想在中国古建筑这门学科中作出重大突破,就必须全力以赴,并且在某些方面付出相当的代价与牺牲。为此,父亲在同母亲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毅然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建筑师事务所收入较丰的兼职,于1932年秋迁居北平,在营造学社专心矢志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就这样,父亲在决定自己的未来事业与命运前途上,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从这时起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不到五年间,对于前来营造学社进行正式科研工作的父亲,是一生中极可纪念的重要时期。在老社长朱启铃先生的具体领导与关心下,担任文献主任的父亲与担任法式主任的梁思成密切合作,改变了过去国内史界研究中国古建筑单纯依靠在案头考证文献的片面方法。而是亲自带领青年助手,或分散、或集中,前往各地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测量、绘图、

摄影等科学技术手段,详细记录了被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其重要数据。返回后再进行全面整理,绘出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最后写出调研报告。这个工作程序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似乎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

抗日战争以前的国内社会经济条件与交通运输状况自然都不能和今日相比。特别是那些十分偏僻的山村野处,不但经济、文化落后,旅行也不安全,而且多半要乘骡马、坐大车甚至步行才能到达。科学家的野外调查不是轻松的郊游野餐,而是辛苦而紧张的劳动,也是对参与者的身体、意志和专业技能,以及思想品德的全面考验。

经常是在长途旅行与劳顿之后,未卸行装,就要马上赶赴现场并开展紧张的考察工作。为了取得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必须钻进灰尘厚积的屋架,或攀登年久失修的屋顶,那些糟朽不堪的梁柱或松散滑动的砖石,都可能给探索者带来致命的危险。而茂草丛生的废墟与久荒无人的洞穴,从中突然窜出的蛇虫蝙蝠,也常会给大家以意外的惊恐。至于风吹日晒、雨打霜侵、攀山涉水、朝出夜归等就更不必说了。

然而一切工作中的困难和生活上的不便,却没能阻挡开拓者前进的脚步。父亲和学社成员们就是这样地无视艰苦,从一个遗址转到另一个遗址,几乎踏遍了北国的山河大地。沐浴着大自然的烈日寒风,使他既显得风尘仆仆而又精神抖擞。特别是长期辛勤的田野工作,带回来前所未有的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更是令人兴奋不已。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建筑,再次向世界显示了它那不尽宝藏的辉煌与丰富。父亲为此感到无比的激动与自豪,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更好地倾注到这一方兴未艾的重大事业中去。因此往往他刚从外地调查归来,就立即日夜相继地着手于资料的整理和撰写。父亲的治学精神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常为一条史料的核实,在浩瀚的文献丛中爬梳整比,努力从字里行间寻找事物的来

龙去脉。或是为测绘资料中某一局部大样或具体尺寸,而反复推敲与复核,务必求得其准确与无误方才罢休。他的生活就是在这看来简单其实繁复的循环中不断的重复,往往上次调查报告还未完成,他又要开始另一次新的远行了。

五年之内,父亲先后调查了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许多古建筑,在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一共写出了总量达50万字的30多篇著作(其中还包括与朱启铃、梁思成、林徽因、鲍鼎、蔡方荫诸先生合作的9篇),大多都登载在学社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第3卷至第6卷上。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官室(《东西堂史料》等)、陵墓(《明长陵》、《易县清西陵》等)、园林(《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宗教建筑(《北平智化寺如来殿》、《龙门石窟调查记》等)、桥梁(《万年桥志略》、《石轴柱桥述要》等)、文献考证(《大壮室笔记》、《明鲁般营造正式钞本样记》等)……依作品形式,亦可分为论文、调查报告、读书笔记、调查日记、书评、古建修缮计划等。在如此短暂的几年中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而且都是靠作者的手抄笔录,若非平日极度勤奋努力,是难以做到的。这些竭尽心力的工作既为我国这门新开辟的学科研究奠定了若干首批基石,又为他自己在毕生为之奋斗的这一事业中,确立了牢固的学术地位。

然而父亲深知:他的成绩绝不是因为个人的单纯努力所取得的,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首先要感谢的是朱启铃先生的知遇之恩以及后来的不断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学社社友间(首先是梁思成先生)的齐心协力和青年助手们的艰苦劳动。在他的作品中,还凝结着那些慷慨捐赠研究经费和学术书刊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拳拳赤心,以及在历次调查考察时各地人民大众提供的协助与服务。最后,才是他自己多年不懈的勤奋与努力。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和周围的人们而单独存在,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因此,尊重别人的工作,并且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不适当的过高地位,就成为他毕生遵循的与后来经常告诫我们的一条不渝

的法则和座右铭。

当时的北平生活费用较南京、上海一带低，父亲刚到北平时的工资比在南京时却差不多减少了一半，但维持一个小家庭的中上消费水平还是颇有余裕的，这样的生活条件，后来逐年又得到了改善。以住房来说，最初我们是住的东城的小绒线胡同，租了一家潘姓房主的西屋，条件不是很好。不久，就迁到顶银胡同的一处小宅，虽然是独门独户，但面积和空间都不够宽敞。最后搬到史家胡同，这是一座颇大的宅第，前后有五重院落，东北角还有一个跨院，父亲的书室就设在那里，所以也是对孩子们的禁区。我和两个妹妹在家里也不大能见到父亲，因为他不是外出旅行，就是去学社上班。吃饭时，我们有自己的小桌椅（是梁伯母送的），和大人不在一起。睡觉也另在一处。只有在某些假日里，当全家都去北海或中山公园时，我们才有较多的时候亲近。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印象比较淡薄，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1931年非法占据我国的东北三省以后，又将魔爪伸向热河、内蒙与冀东，一时北平、天津等城市也都笼罩在侵略者的阴影下。尤其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年，战争的气氛格外浓烈。北平城内经常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浪人”踉跄街头，无端惹事生非；或是挎着战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三五成群地到处“观光”。而日军的频繁调动与军事演习，更是时有所闻。当时的北平，正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境地。许多人已经或正在离开这座危城，但父亲和营造学社的其他人员，为了继续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

随着日寇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分化政策。这是一整套的欺骗与分化的伎俩，妄图在思想上麻醉与分化中国人，达到其彻底统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目的。手段之一就是派遣少数为虎作伥的无耻之徒，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处进行游说，企图用高官或厚利来收买、拉拢一批中国人为他们服务。大概是

因为父亲近年来在学界已崭露头角，或者是有过在日本长期学习与生活的经历的缘故，竟然也有人写信来，劝说父亲去承德为“满洲国”修理避暑山庄，允预支付的酬劳费可达当时货币的五位数字。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对某些财迷心窍的人来可说是很大的诱惑，但绝打动不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心。父亲的回答是嗤之以鼻，并把这封信送交给老社长朱启钤先生存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炮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宋哲元将军指挥的二十九路军在优势的敌人进攻前英勇抗击，北平城内外到处传颂着大刀队在喜峰口、南口和宛平城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大大鼓舞了故都人民和全国同胞。这时，北平各大学的教授们发起了严正斥责日寇侵略暴行与坚决支持抗战到底的联名信，父亲也在这信件中签名，以表示自己对此一声明坚决拥护的明确态度。

由于敌我军事力量悬殊，以及为了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不致遭受战火的破坏，驻守城内外的中国军队奉命于7月30日忍痛撤离，于是这一闻名世界的古都遂沦陷于敌手。既然形势急转直下，北平这块为日寇控制的险地已不可再留，父亲决意立即举家南迁，但临行极为仓促，随身只带了很少一点衣物，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竟会延长到八年之久，而下次的返回已是在十多年以后了。离去时家中留下的一切物件书籍，自然早已化为乌有。

我们和梁伯伯一家由北平乘火车同往天津，沿途看到许多满载全副武装的日军和涂着迷彩的大炮、车辆的列车向南开去。我们车上的日本军人和侨民个个兴高采烈，而中国乘客都默默无言，连孩子们也收敛起自己的淘气，不敢乱说乱动。到了天津，我们住在英租界的一座小楼里，当时南下的铁路交通已因战事而阻绝不通，要离开天津，只能经由海路，但船少人多，必须耐心等候。那年的秋天阴雨连绵，天气特别寒冷，面对着室外晦暗的风雨和室内昏黄的灯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